



鲁迅的一世纪

——朱正谈鲁迅

朱正◎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K825.6/288

2007



鲁迅的一世纪

——朱正谈鲁迅

朱正◎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的一世纪——朱正谈鲁迅/朱正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11

ISBN 978 - 7 - 216 - 05360 - 0

I. 鲁…

II. 朱…

III. 鲁迅(1881~1936)—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2432 号

鲁迅的一世纪

——朱正谈鲁迅

朱 正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 毫米×980 毫米 1/16
字数:238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6
插页:4

版次: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数:1 - 6 000

印次: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5360 - 0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自序

我在1956年出版了第一本书《鲁迅传略》，从此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在这以后的五十多年里，出的书，写的文章，有不少都是谈鲁迅的。这固然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兴趣所在，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鲁迅研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史方面首屈一指的显学。在这里，聚集的研究者多，发表的成果也多，我只是凑热闹的一人。不过我起意研究鲁迅，却还是这题目在中国成为显学之前。前些年清理杂件，无意中见到我上中学时写的几页草稿，哦，是了，这岂不是我试写的鲁迅传记的片段么。这给鲁迅做传的意图一直没有放下来，几年之后终于出版了那本《传略》。

回想起来也真够荒唐的。那时，我除了通读过已经发表的全部鲁迅著作之外，像周作人、胡适、陈独秀这些人的书都没有读过，关于鲁迅，其实是所知甚少的。这样一本粗疏肤浅的书居然也出版了，一是它赶上了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这个大活动，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完全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举一个例：我在写到1936年左翼文坛两个口号之争的时候，就说鲁迅是受了反革命分子胡风的蒙蔽。虽说我引用了《人民日报》刊登的那些把胡风妖魔化的文字作为论据，却不去想一想这些是真实的吗。特别不应该的是，此书是在肃反运动中写的。那时我自己正是一个失去了人身自由的肃反对象，从亲身经历中，我深知诬人小组（官文书写作五人小组）对我的揭发，检举，定案，全都是血口喷人的诬枉之词，为什么就不能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地去想想那些“揭露”胡风的文字呢？如果这本书稿就因为这种倾向而被选用，那么这个起点真要令我感到羞耻。所幸的是我在不久之后即被打成右派分子，这本书因而不印行。到1982年我将它增订重印的时候，这些胡言乱语当然都删去了。

就是这个1982年出的修订本，也还是不行的。在1982年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又出现了不少直接和间接的鲁迅传记资料，有可能给一些事情说得更清

楚一些了。当然,也因为这些年里自己的见识多少有点长进,于是重新做了一本《鲁迅传》让它取代原来写过两次的《鲁迅传略》,希望这一本能够留下来。

在我写的有关鲁迅的书里面,《鲁迅回忆录正误》订正了许广平等人所写回忆录中的史实错误,很用了一点心思。《重读鲁迅》(同邵燕祥兄合著)在分析鲁迅作品的时候,介绍了一些相关的背景材料,提出了一些和旧说不尽相同的意见。这两本,我自己比较看重,也是希望能够留下去的。

1980年以后,我陆续写了不少谈鲁迅的单篇文章,有些是应报刊编辑者的约稿,命题作文;有的是为自己编的刊物作补白,介绍一点零星资料;当然也有自认为在研究中稍心得,写出来贡献给读者的。历年所写的这些文章,加起来怕有三四十万字吧。曾经结集过一回,那就是2001年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论集》,收集了截止那时为止我谈鲁迅的几乎全部文章。版权页上未载明印数,听说怕卖不掉,只印了一千本,那么看到这书的也就只是一千人了。这样倒也好。例如书中所介绍的一些资料,已经被《鲁迅全集》的注释采用,不必再以原来的形式保留在我的书中,我也无意将这本《论集》重印了。现在只从其中选取比较可读的几篇,再加上这几年的新作,编成了这一本。从所收的每一篇里,可以看出我写作当时的见识和写作环境,许多字句都反映了当时的色彩,今天来看显然是过时了。不过我都不加改动,好让读者看到我也是从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个环境走过来的,我也深深受到过那样的影响。这些影响在近年来所写的中间才摆脱了。从这前前后后的文字里看,自己的见识还是有点长进的。最后,我把《论集》“题记”中的一段话转录如下,以结束这篇序言:

稍可自慰的是,近年写的几篇比早年写的似乎稍有一点进步。早年偏重于考据,只能说是弄清楚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为进入研究准备条件。近年所写,套用古人的术语来说,是在考据之中稍稍涉及一点义理了。今后再写,我还想是多在这方面用力。考据文章,结论常常是唯一的,不容异议。一涉及义理,可就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了。读者必有不同意见,欢迎提出来讨论。

2007年8月27日 朱 正于北京

目次

1	鲁迅的一世纪
18	从文献学的角度看鲁迅研究中的资料问题
35	学鲁迅的为人
39	鲁迅传记资料的真伪问题
52	半个世纪
56	谈《鲁迅全集》
75	举一点例
80	保护法律
85	关于一条注释和一篇附录
95	这叫“审读”吗？
111	新版《鲁迅全集》的得与失
119	略说《鲁迅全集》的五种版本
127	谈谈《鲁迅全集》第六卷
134	鲁迅生平研究二十年
151	鲁迅死因“正、反、合”
156	“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

(上)1946 年的答案

172	“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 (下)1957年的答案
188	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
205	删掉的信息
210	《周佛海日记》中的鲁迅兄弟
215	“木瓜”其人其事
221	小人张凤举
225	鲁迅与邵洵美
235	异中有同
243	陈赓是何时会见鲁迅的
247	“我”是谁?
250	補阙两则

鲁迅的一世纪

鲁迅作为一个著作者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的眼前,是在1903年,二十世纪刚刚开始,到今天是一百年出头了。这年6月,日本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杂志第五期上刊出《斯巴达之魂》,作者署名“自树”,这是鲁迅公开发表文章的开始。

义和团之乱引起了八国联军的入侵。1901年9月,清廷接受了谢罪、惩办祸首、赔款等等屈辱的条件,签订了辛丑条约。接着各国联军开始撤退。可是俄国却拒不从东三省撤兵。几经交涉,到1902年4月8日,中俄才签订东三省撤兵条约,规定俄兵于十八个月内分三期撤退。到了1903年4月8日,俄军应该退出沈阳、牛庄、营口、辽阳和吉林,可是不退。俄国反而向中国提出七项新要求。这就激起了中国人的愤怒。4月27日,上海张园开拒俄大会,反对俄国对东三省的新要求。4月30日京师大学堂学生大会,拒绝俄国要求。愤怒的情绪扩大到了国外的留学生中间,4月30日,东京中国学生拒俄义勇队成立。5月2日拒俄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就参加了这一活动。拒俄义勇队成立,即函电各方,在致北洋大臣袁世凯函中说:“昔波斯王择耳士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尼达士亲率丁壮数百扼险据守,突阵死战,全军歼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荣名震于列国,泰西三尺之童无不知之。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可以吾数百万万里之帝国而无之乎!”鲁迅的这篇《斯巴达之魂》,写的就正是这次德摩比勒(今译温泉关)之役。文



鲁迅。1933年9月13日摄

章气势磅礴，该刊编者许寿裳说，“文中叙将士死战的勇敢，少妇斥责生还者的严厉，使千载以下的读者如见其人”。可以认为鲁迅是以这篇文章参加拒俄运动，他的写作活动从一开始就是怀着救国的、爱国的目的。这种态度，一直贯穿着他整个一生的文学活动。

鲁迅在日本留学。他看到，刚刚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同衰败的晚清，对比是太强烈了。这更加深了他的忧国之心。在将两国比较的时候，他还采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国民性。在他晚年的一封信中说：“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

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14卷第410页，以下《鲁迅全集》的引文出处只注卷次及页码，不注书名）许寿裳在《怀亡友鲁迅》一文中回忆说：“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鲁迅是为了探索救国的道路，为了改变国家的命运思考这些问题。

正是这些思考决定了他对人生道路的选择。“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第一卷第438页），使他一度学医；后来受到刺激，“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第一要着，是在改变国人的精神，从而选定文学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在这些年里，他读得多，也想得多。因此，他1907—1908年在《河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不只是反映出一种爱国的激情，还有他自己的不少思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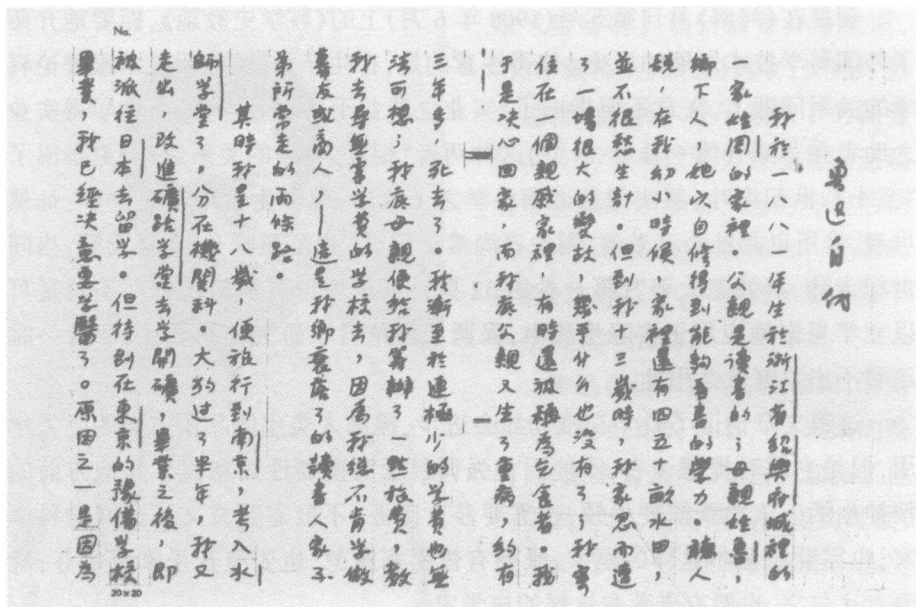
刊登在《河南》月刊第五号(1908年6月)上的《科学史教篇》,扼要地介绍了外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在生产活动、应用技术跟理论科学的关系问题上,文章不但指出了“实业之蒙益于科学者固多,而科学得实业之助者亦非鲜”(第一卷第33页)这种两者“相互为援”的关系之外,更指出了“至十八世纪中叶,英法德意诸国科学之士辈出,质学生学地学之进步,灿然可观,惟所以福社会者若何,则论者尚难于置对。迨酝酿既久,实益乃昭,当同世纪末叶,其效忽大著”(第一卷第32页),以见理论科学的研究并不总是可以立竿见影地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强调了理论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尽管一时还看不出它有什么用处。

这篇文章论证了科学在推动社会进步、提高人类生活品质方面的巨大作用,但是它同时提醒读者,不能因为强调科学的重要性而忽视了他方面的精神生活。人类既需要牛顿,也需要莎士比亚;不但需要波义耳这样的科学家,也需要拉斐尔这样的画家;既要有哲学家康德,也要有音乐家贝多芬;既要有达尔文,也要有卡莱尔这样的史学家。

《摩罗诗力说》介绍了以拜伦为代表的被人称为“恶魔派”的诗人。后来,鲁迅在《杂忆》一文中说:“那时拜伦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那时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密茨凯维支;匈牙利的爱国诗人裴多菲。”(第一卷第233~234页)后面这两位,在《摩罗诗力说》里也都作了详细介绍。此外,还介绍了挪威的易卜生、英国的雪莱、俄国的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等等。

鲁迅在介绍了这些他所喜爱的、引起他心的共鸣的作家之后,想起了中国。他问道:“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悲哀的是,他接着答道:“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貽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非彼不生,即生而贼于众,居其一或兼其二,则中国遂以萧条。”(第一卷第102页)文章里没有说的是,它的作者,已经决定自己来担当精神界之战士的使命了。

鲁迅在《河南》上发表的文章,《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这两篇最可注意,它显出了作者对中国现状的深思。那时,中国必须变革,这可以说是已经



鲁迅自传的手迹

成了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的共识。在东京的中国人,从政治上的亡命客到留学生,有主张民主革命的,也有主张君主立宪的,活动很多。鲁迅自己参加了留学生的一些活动,观察了不少号称爱国志士的人物,了解到了他们的主张和作为,于是在这两篇文章里对这些作出了自己的评价。

出国留学,目的是给中国图富强。到外国学些什么才好呢?鲁迅看到的是:“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第一卷第45~46页),“眩至显之实利,摹至肤之方术”(第一卷第29页),“试按其实,乃并方术且非所喻,灵府荒秽,徒炫耀耳食以罔当时”,“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第八卷第27页)。

鲁迅以为,学外国,重要的还不是那些应用技术之类。“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此,槁丧且不俟夫一世。”(第一卷第58页)提出了“立人”这个首要目标。具体的纲领,鲁迅提出:“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

求既往,相度方来,掇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第一卷第47页)假如能够做到这一点,“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第一卷第57页)应该指出的是:他在这里说的“世界之思潮”,主要是指尼采的学说。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就说过,他在弘文学院,就爱读尼采的书了。明白了这时鲁迅所受尼采的影响,就可以知道他这些文章里写的“少数”和“多数”,并不只是个数量的概念,而是尼采所说的“超人”以及与之对立的庸众。他是把希望寄托在超人身上:“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器,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鹭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骂,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第八卷第27页)“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则多数之说,缪不中经,个性之尊,所当张大。”(第一卷第54页)显然,这英哲就是尼采说的超人了。

二

1911年的革命推翻了清王朝。鲁迅成了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的官员。十多年之后,他在一封信中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第十一卷第469~470页)

这样,又回到国民性的问题上去了。这时他给《猛进》周刊编者徐炳昶的信中,说得更加痛切:“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

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强聒不舍’,也许是一个药方罢,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们——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第三卷第22~23页)

他想到的唯一的办法,是循着《新青年》开创的路走下去。陈独秀1916年创刊的《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旗帜就是民主和科学。1918年9月鲁迅开始在上面发表文章,“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陈独秀《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但就倾向来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第四卷第468页),“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第一卷第307页)。

在《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钱玄同、吴虞等人的文章,对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持激烈的批判态度。鲁迅为了批判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批判旧的伦理观念,反对保存“国粹”,也写了好些文章。他说: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第一卷第321~322页)

试看中国的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身卖买,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拖大辫,吸鸦片,也正与土人的奇形怪状的编发及吃印度麻一样。至于缠足,更要算在土

人的装饰法中,第一等的新发明了。(第一卷第 343 页)

反对了保存国粹,就要引进外国的观念:

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 Apollo。(第一卷第 349 页)

主张保存“国粹”的人,对于引进“西学”,一种态度是抵制和排斥。鲁迅描写说:“从前排斥外来学术和思想,大抵专靠皇帝;

自六朝至唐宋,凡攻击佛教的人,往往说他不拜君父,近乎造反。现在没有皇帝了,却寻出一个‘道德’的大帽子,看他何等利害。”(第一卷第 316 页)即以“道德”的名义来抵制“西化”或曰现代化。

另一种态度要开明一些,主张将“西学”和“国粹”调和起来。鲁迅描写说:“闻所未闻的外国人到了;交手几回,渐知道‘子曰诗云’似乎无用,于是乎要维新。维新以后,中国富强了,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更要昌明。换句话说,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第一卷第 352 页)



鲁迅在日本宏文学院的毕业照。1904 年 4 月摄于日本东京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然不失为一种主张。若问：这种主张能不能行得通呢？能不能够“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呢？”鲁迅回答说：“‘西哲’易卜生盖以为不能，以为不可。所以借了 Brand 的嘴说：‘All or nothing!’。”（第一卷第 353 页）

这些不过是举一点例。在鲁迅的文章里这一类意见还可以摘引出许多来。我们还记得，批胡适的时候，批过他的“全盘西化论”，批胡风的时候，批过他的“民族虚无主义”。那么，怎样来评价鲁迅的这些意见呢？依我看，这些意见不多不少就是全盘西化论。不要以为这只是他在《新青年》时代的观点，到了 1934 年他还说，“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第六卷第 84 页）。这可是毛泽东说的他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后期的杂文”（《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 253 页）。应该看到，固有文化的保守性或者说惰性是很大的，即使以全盘西化为目标，努力接受外国的先进文化，旧文化的惰性也会对接受的幅度加以强有力的限制，并不会失掉固有文化的特征。鲁迅说过：“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第四卷第 14 页）把话说得极端一点，绝对一点，在事实上也有他的必要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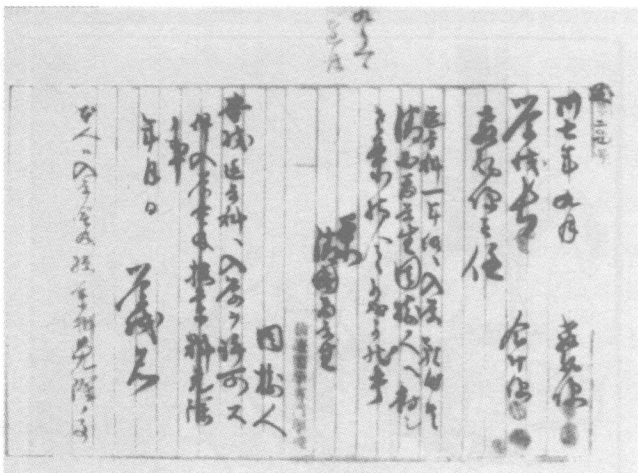
时间过去几十年之后，回过头来看就一切都明白了。要不要保存“国粹”，要不要现代化（即“西化”的同义语），这问题早已由生活给出了答案。我们对鲁迅以及当年许多为此作了努力的人们满怀崇敬和感激之情。经过他们的努力，“国粹”一词，是早已没有人再说了。不过近年又出现了一个类似的新词，叫做“亚洲价值”论。这是“国粹”（“中国之粹”）的放大，性质却是相同，提出来的也是为了抵制世界先进思潮。预料它最终也将同五四时期喧嚣一时的国粹论同其命运吧。

三

1917 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夺取了政权。为了摆脱孤立的处境，于 1919 年建立了第三国际。第三国际即派人到各国去组建共产党。1921

年维经斯基来到中国，找到了陈独秀、李大钊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

这些历史上的大事件，在发生的当时，鲁迅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反应。他还是在书斋里写他



鲁迅的仙台医专入学通知

的《彷徨》，写他的《野草》，办他的《莽原》。晚年，他在答苏联国际文学社问中，说他当初“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第六卷第19页），是确实的。至于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袖人物陈独秀、李大钊，是《新青年》的同人，鲁迅了解他们，知道他们都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和进步而努力的人物，虽然他并没有参与他们的活动，可是同情他们的事业。他1926年9月从厦门寄给广州许广平的一封信中说：“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第十一卷第546页）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来。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从1928年初开始，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发动了猛烈的批判。创造社中人好些是共产党员，太阳社几乎全是共产党员。冯乃超、李初梨、钱杏邨、彭康、潘汉年、弱水（潘梓年）、石厚生（成仿吾）都写了文章。骂得最出格的是杜荃（郭沫若）的《文艺战上的封建余孽》，说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不消说他是根本不了解辩证法的唯物论。”说鲁迅和陈西滢、高长虹的论战是“猩猩和猩猩战”。

鲁迅写了《“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好几篇文章反驳



《阿Q正传》封面

冯乃超、李初梨他们。对于署名杜荃的这篇，鲁迅回答说：“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封建余孽出风头，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观’上都没有说明。”（第四卷第213页）

因为这些人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来批判的，鲁迅要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第四卷第6页）

到了1929年，这一场批判就停了下来。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的干预而停下来的。1930年3月，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的人一起组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联里一些年轻的共产党员，柔石、殷夫、冯雪峰，很接近鲁迅，鲁迅对他们有很好的印象。

鲁迅以他过去在文学工作方面的成绩和声望，以他现在的政治态度，成